

陳友德開發富里滄桑

陳和桶 口述

黃學堂 整理



* 黃學堂 退休教師

陳友德（1903—1970），苗栗頭份人，1934年率家族遷移花蓮富里，以搬運原料甘蔗起家。光復後，設紅糖廠、開米廠，並經營戲院等，跨足農、工、商等產業，曾當選富里鄉農會理事長、富里鄉民代表會主席等。陳和桶為家族事業實際經營者，本文以陳和桶先生手稿及訪談為依據，敘述富里產業變遷，並見證客家移墾的一頁滄桑史。



陳友德攝於1964年富里鄉代表會主席任內（富里鄉民代表會提供，黃學堂翻拍）



陳和桶攝於1960年代（陳灶榮提供，黃學堂翻拍）

從頭份到富里

日治大正八年（1919），我生於苗栗頭份郡尖山下鹿廚坑一〇八番地。祖父陳阿來、祖母黎新妹，祖母外家黎氏，早先移來東部，散居玉里、富里等地，其中一房在玉里開設「廣修堂」漢藥店。我和母親林長妹、父親陳友亮，以及二叔陳友德、三叔陳有福同住老家，薄有田產。在我十歲那年（1928），農曆七月，三叔病逝；八月間，母親去世；十月，曾祖母也去世了。二叔陳友德，讀過漢文，略通文墨。¹三叔本來在市場殺豬賣豬肉，

1 據陳和桶口述。《富里鄉誌》則載其為「國小畢業」，見張振岳主編《富里鄉誌》，p.724。花蓮縣富里鄉公所，2006.1。

於昭和三年（1928）病逝後，遺下一子金水，被賒欠的豬肉舊帳討不回來，導致所貸一萬日圓無法償還，祖傳頭份尖山下的房屋土地全部被抵債。十二歲時，舉家遷到頭份，租水田耕作，由於遭受稻熱病，毫無收成，生活陷於困境。

為了維持一家十幾人的生計，我自小學畢業後，跟著二叔陳友德在家鄉打零工，農忙期幫人代耕、插秧、割稻等，平常桃柴賣木、販售地瓜換些米糧。每年四月間，原料甘蔗採收期，就搬運甘蔗到附近的糖廍，路程四、五公里，工資憑重量計算。當時（1932），男性工資一天二角五錢，女性一角五錢，搬運原料甘蔗收入較好，一天可得三角二錢。十四歲時，我學習燒木炭，在大湖築窯燒炭，一萬台斤工資三十日圓，一個炭窯三千多台斤，要燒一個星期之久，一個月燒三個炭窯。因所得有限，舉債度日。昭和九年（1934），我曾昏迷三天，差一點斷氣，幸有祖母照顧撿回一命。我剛病好，祖父又病，這年農曆七月，七天之內死亡三人，都是十一、二歲的小孩子。經家族商議，決定舉家遷移他處，聽說東部謀生較易，於是二叔陳友德先到花蓮探路。當時，台東線鐵道已全線通車，而舅公家住公埔（今花蓮縣富里鄉富里村），便乘火車抵達公埔。經舅公黎阿鳳帶往附近觀察後，見人口不多，尚有發展空間，陳友德回頭份後，積極準備東遷。同年農曆十月十二日，全家離開頭份，自竹南搭火車到蘇澳，在蘇澳換乘汽車，途經花蓮住一宿。次日，乘東線客貨兩用火車，下午抵達公埔（1937年改稱富里）。

鯉溪甘蔗原料區

初至富里時，陳友德三十一歲，我十六歲，長兄金和年十七，弟金信

年十四，陳友德的兒子金煥年幼，由陳友德當家，我們兄弟三人全力配合工作。當時，富里有許多苗栗南庄鄉親，經他們告知：富里東邊鰲溪（1938年改稱永豐村），還有很多林野地可開墾，不用承租、不用納稅，種植作物也沒限制，鰲溪盆地之中，有一間製紅糖的蔗廊，附近有些人家。二叔和一位鄉親前去拜訪那糖廠，廠主陳秋傳表示：需要搬運甘蔗的工人，陳友德表示有意參加搬運工作。沿著蔗廊旁邊的小河，有一牛車路可走，通到海岸山脈西側的山腳下，有一戶人家，自台北州遷來，屋前有四、五分地水田，旁邊旱地種植番薯、甘蔗等。那山泉水清澈豐沛，陳友德前往拜訪那家人，詢問可否前來開墾。由於當時山豬對農作物損害嚴重，這戶人家認為：如果有人在周邊開墾，則其作物不致直接受到山豬之害，因而欣然同意，歡迎前來開墾。第三天，陳友德夫婦和我前往山腳下覓地開墾，只見當時長林豐草，樹頭下全長滿黃藤，於是我們伐木開荒，將砍下的樹木賣給糖廊當燃料，並燒除雜草，種植甘蔗。當時，還沒有風飛草，新開的林野地非常肥沃，不用施肥甘蔗就能成長良好。

昭和十年（1935）冬，糖廊即將開工，為搬運甘蔗之需，陳友德以日幣四十圓訂製一台牛車，又以三十圓買一頭牛。我從十六歲起，開始學習駕駛牛車，搬運甘蔗非常辛苦。牛車路沿河谷而行，但甘蔗園多數在坎頂，由坎頂到河谷，坡度很陡，牛車直行而下不能轉彎，否則會翻車，同時，要用粗繩綁住車輪，增加抓地力及煞車功能，以防失控翻覆。平地部分，因為粘性土質，大雨過後，牛車路積水難退，要鋪乾草、樹枝等物，以免牛車深陷其中。通常，這裡的甘蔗在梅雨季節前搬運完畢，但是到了次年端午節前夕，鰲溪山坡地還有很多甘蔗尚未採收，原因是本庄糖廊所產糖質太軟，銷路不佳，蔗廊業主沒有資金給牛車班發工資，沒有人願意去搬運。不久，該糖廊宣布倒閉，蔗農損失慘重。鰲溪甘蔗原料區，由馬太鞍（今花蓮縣光復鄉）的「塩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大和工場」接收。昭和十一年（1936）七

月，該會社開始推廣蔗作補助，提供貸款及肥料，但多數蔗農對糖廠已無信心，當時流傳：「第一愁，種甘蔗給會社磅。」²蔗農爭相低價出售老頭蔗園，陳友德就貸款買下這些蔗園，到日治末期，共有數十甲之多（均係官有地）。這年冬季，會社開始採收原料甘蔗，山坡地用牛車搬運到卡車可到之處，再由卡車運到火車站，換裝火車運到馬太鞍製糖工場過磅，採收至次年（1937）春季結束。至此，陳友德稍有存款，即回西部清償舊債。

昭和十二年（1937）七月七日，中日開戰，不少台灣人被徵調到大陸當軍伕，西部年輕人為逃避徵調，紛紛前往東部。陳友德回苗栗頭份時，看到很多青少年要來東部，而本年冬季會社的甘蔗搬運工作，陳友德有意承攬來做，正需人力，就帶了數名少年回富里，還有不少親友前來幫忙，工寮的搬運工人多達三十餘人。這年，仍有很多青少年相繼前來東部，陳友德計劃擴大開墾，便以竹、木搭建工寮，收容五六十位工人，在永豐東邊的山腳下開墾、種蔗。冬季將到，製糖會社計劃興建輕便車軌道，從富里火車站起，直線到蚊子洞，³分線到談保窟，但那年冬季才做到富里街尾。昭和十三年（1938），東富公路完成富里至永豐石門路段，⁴於是先沿東富公路採收，用牛車搬運到火車站，牛車路由會社出錢修建，路況較前改善，陳友德所承攬的甘蔗搬運工作，共計七台牛車，一天來回兩次，可積二火車台，共十四噸重。這些粗重的工作，都是我們三兄弟負責現場搬運、指揮、監工，到次年四月，採收工作結束。

昭和十五年（1940），陳友德承包輕便車小鐵路工事，負責清除雜草、修補路基等，橋樑、橋柱全是二級檜木建造，材質不會變形。施工時，我指出橋的高低有誤差，日籍監工不相信、不肯改；驗收時，日本當局指責我，我就當面揮拳打了日籍監工，他自知理虧，不敢還手。本年採收甘蔗方

2 張振岳主編《富里鄉誌》，p.871。

3 蚊子洞位於海岸山脈西側，丘陵起伏。昔時因下雨之前，有成群蚊子飛舞如龍捲風狀而得名。

4 由玉里鎮民、富里鄉民分尺寸義務勞動修築而成。

面，由父親監工，但父親不久即病逝，得年四十三歲，牛車班仍由我們三兄弟負責。本年冬季，工作十分忙碌，每天忙到午夜，凌晨四點又要起床，用餐後出門，每台輕便車一男一女配好，到永豐山下臭水溝時，才天色發白。由於輕便車不夠用，主要仍靠牛車搬運，七台牛車，一天來回三、四次。永豐臭水溝的甘蔗，都種在較高的坎頂上，載運三千多台斤重的甘蔗下坡，牛的四腳根本無法行走，只能直撐打滑而下，到溪邊才能開步行走，牛蹄往往受傷流血。有一天，會社上級人員前來考察牛車路，直說這條路太危險，牛也太辛苦，對我們駕駛牛車的技術感到不可思議。有一次，雨後牛車路的濫泥形成窟窿，牛車載重陷入翻覆，牛隻幾乎不能呼吸，我用小刀割斷牛繩，始救回一條牛命。至今，每當回憶起這段駕駛牛車的情景，夜間睡覺手腳都會發抖。

除原料甘蔗外，我們家在富里火車站前、樣子寮、羅山、永豐等地，又承租了水田、旱地共十九甲多；冬季搬運原料甘蔗時，水田由祖父陳阿來帶領工人耕作。昭和十七年(1942)以後，因戰爭吃緊，原料甘蔗停辦，但我們在坎頂、無毛坪的蔗園，仍留有甘蔗的「祖公種」。當時，日本政府設有番薯組合，我們到富里村對面中央山脈下的學田種「台南種」番薯，共計九甲多。採收時，較小的番薯買主不要，棄置在園地，許多婦女都會來撿拾，稱為「撿番薯腳」；光是「番薯腳」，一天就有六十多擔。在戰爭的「非常時期」，糧食欠缺，日本政府開始「抄穀、節米」，上級來抄穀前，我們想辦法將稻穀扛到山腳下藏起來。昭和十八年（1943），開始徵調「公工」（義務勞動），牛車及牛也被徵調，為期一個月；不便前往者，自行請工人去代理。美軍空襲期間，田園荒廢，農民無米可吃，多數以吃番薯籤度日。我們家由於人多，利用剩飯剩菜養豬，建一間豬寮、養七頭豬，一年賣出三次。空襲期間，豬隻數量列入管制，我們將大隻的私宰後，又買較小的補足數量，官員來查，問說：「你們的豬怎麼越養越小？」

光復後，政府實施「耕者有其田」政策，日產地、會社地、鎮有地和私有地放領給承租戶，承租戶要繳所得的百分之三七·五給地主。承租國有地者，水田繳公租穀，旱地繳租金。地租一年分兩期，十年繳清，水田地主則繳田賦穀及隨賦收購，但收購價比市價低。當時，我們家在永豐的甘蔗園，被放領了十多甲，光復後才買的一甲多水田，也放領給承租戶了。土地被放領的地主，政府有公司股票及糧食債券補償，糧食債券可繳公糧或換米來吃，但股票有何用處，一般人搞不懂。當時，有一位外省軍人來我們家收購股票，陳友德就以一張三十元的代價全部賣掉，平均一股只值三角錢。

民國三十六年，糖業恢復生產，光復糖廠（原「塩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大和工場」）開始獎勵種植甘蔗，無毛坪的保護林地（東山糖廠所在地）也可以開墾，我們便開墾來種蔗。我們家本來就留有蔗種，便在無毛坪、臭水溝、坎頂等處大量栽種。這年，因原料數量不多，糖廠要蔗農自費運送到火車站。民國三十八年四月，國民政府貨幣改革，舊台幣四萬元換新台幣一元，當時新台幣尚無紙鈔，全是硬幣，面額最大者是白色的五角硬幣。這年冬季，有原料甘蔗可出，一百公斤赤膊糖（未稅）可換六百台斤稻穀，我們家領到的糖錢，糖廠用卡車運送到家，我們兄弟將這些硬幣扛到富里農會儲存，扛了好幾回，總計新台幣十八萬多。因糖價好，山腳下的綠竹林也被挖來種甘蔗。三十九年冬季，我們在保護林的新墾地也有原料可出，永豐上埔園、魏屋坪也可採收；同時，也有承攬原料搬運工作。當時，石牌、明里、樣仔寮蔗農的原料甘蔗也有不少，我們用牛車直接運到富里火車站，到民國四十年四月結束。

永豐糖廠

民國四十年四月，原料甘蔗採收結束後，光復糖廠宣佈：距離富里火車站三公里以外的甘蔗，不再接受。我們家位在永豐的甘蔗園，全部在火車站三公里之外，糖廠均不接受。這時，正好花蓮縣政府一位課長到我們家做客，得知消息後，就向陳友德建議：「光復糖廠不收，就自己申請成立永豐甘蔗原料區，同時申請設立生產紅糖的糖廍，用牛力壓榨，大鍋來煮。」於是，陳友德提出計畫書，申請設立紅糖廠，課長也答應幫忙。

一、牛力及水力壓榨

民國四十年冬季，我們仍然承攬光復糖廠的原料搬運工作，做到一半，設立紅糖廠的申請核准下來。於是，我們開始籌設糖廠，機器設施參照苗栗一家紅糖廠的樣式。那時，東部還沒有壓榨機件可買，就到苗栗竹南劉姓的鐵工廠訂製壓榨機件。初時，糖廠壓榨機完全用牛力拖，五個大鍋煮，糖廠設在永豐村番社外河中央的溪埔之上，計畫將來利用水力。日製雙頭水力タ-ピン，一台要價新台幣二萬元，向豐原東勢路的廠商訂購，我先向他們說明裝置地形、樣式，他們將安裝圖先寄過來，民國四十一年二月，水力發動的タ-ピン運到，我用牛車從火車站載回工廠，一天內即安裝好。不久，竹南鐵工廠的壓榨機件也運到，並派二位技術人員前來安裝，車心安裝妥當，待次日水庫水泥封口凝固，進行試車，順利運轉。紅糖廠雖有水力可用，同時也使用牛力，以便工人有事可做。此時，由於農戶插秧結束，河中水力充足，民國四十二年四月，製糖工作順利結束。當時，紅糖用麻袋包裝，容易潮溼，每年七、八月又常有颱風、豪雨，為避免紅糖遭洪水流失，我們又另外在富里街上租倉庫存放。

設廠初期，雖然一切順利，但糖廠經營卻歷經波折，天災、意外、查稅、官司等相繼而至。民國四十二年十月，製糖工作即將展開之際，河中埔頂的廠房遭人放火，茅草屋頂全被燒光，只好臨時在新墾地（無毛坪）用牛力壓榨，待河中心糖廠修復後，再進行水力壓榨。當年因雨水不足，水力有

限，只用一個鍋爐煮，到四十三年四月，製糖工作結束。民國四十四年，「永豐糖廠」正式登記立案，有四十噸級的壓榨量。⁵這年冬季，原料甘蔗產量頗豐，且水力很足，銷路暢旺，至四十四年四月止，一切順利。製糖期間，工人每天伙食要吃掉一百公斤的米，盛況可以想見。

未料，民國四十四年舊曆七月尾、八月初，一陣颱風大雨，河中糖廠全被沖毀，連同六個工人慘遭滅頂，在糖廠煮飯的陳友德之岳母也被沖走，遍尋不著。廠方善後，損失慘重。由於來不及重建，四十四年冬季製糖，完全用牛力壓榨。一天晚上，工人阿森夜間趕工，牽牛時，不明原由死在壓榨現場。經向永豐派出所報案後，有關單位派員前來驗屍，查不出傷口及病因。家屬要求賠命錢三千七百五十元，我們同意如數給付，並自郵局匯款入其帳戶。之後，該款被受害者親友領走，並慫恿家屬向台東地方法院提出告訴，聲稱：沒有收到錢。台東地方法院傳訊陳友德到案說明，經開庭查明事實後，我將郵局匯款存根聯以雙掛號寄去，才告結案。

二、發動機及電力壓榨

民國四十四年夏，河中糖廠遭沖毀後，我們將河中原有壓榨機及水力發動的タ-ピン拆下，請竹南鐵工廠派人來重新組裝，在無毛坪另行設廠，自費請人開水圳、築水庫，並在崁頂建一倉庫，前面放糖，後面當工寮。時值二期稻作農忙期，農田用水量大，唯恐糖廠水力不足，陳友德去竹南購買發動



陳友德「永豐糖廠」及「梅源米廠」使用的發動機（2008.6.15黃學堂攝）

5 《富里鄉誌》，p.936。

機。然而，買來一台舊式野馬牌十五馬力的發動機，馬力不夠，只可壓榨小枝甘蔗，供二個鍋爐煮；主要仍靠水力推動。至於距離較遠的木瓜會社（在石門後方），原料搬運困難，當地暫時仍以牛力壓榨。那時，紅糖改用紙袋包裝，每包三十公斤，便於搬運，每天生產二十包左右。⁶至四十六年春季，甘蔗壓榨完畢，將發動機搬到米廠使用，效率不錯。

民國四十六年秋，省政府特產科函全省各紅糖廠：派員到台中烏日改良場講習一個星期。當時，台灣省的紅糖廠共有八十多家，東部有新城、⁷永豐、泰源、都蘭、利吉等五家，我代表永豐糖廠前往講習，報到者八十多人，我是唯一來自東部的業者。講習結束後，大家建議要用野馬牌二十馬力的發動機才夠力。那一陣子，西部製茶工廠全部改換電力，有很多發動機要賣，我隨即到竹南鐵工廠買了一台二十馬力的發動機，用火車運到蘇澳；由海運送抵花蓮，再由花蓮貨運載到我們糖廠，安裝後順利運轉。民國四十七年三月，為搬運甘蔗及紅糖之需，我們向富里鄉公所買一輛舊式卡車，換一個日本製的輪胎要五千多元，四個一共花費二萬多元。除了搬運原料、紅糖外，有空時還到河邊搬運砂石。

民國四十八年春季，紅糖壓榨完畢，除了配售玉里以下、關山以上及本庄之外，全部賣給台東蔡欉。有一天，我向蔡欉領了四萬元糖款，要到竹南繳壓榨機件的費用。當時，紙鈔面額最大只有十元，四千張鈔票有好幾斤重。四十八年冬季將至，我到新竹訂製



陳金信攝於「永豐糖廠」壓榨機前（陳灶榮提供，黃學堂翻拍）

6 《富里鄉誌》謂「年產紅糖約一萬包（每包三十台斤）」，p.677，但陳和桶認為與事實不符。

7 新城糖廠係馬有岳所經營。

油壓機，又到松山訂製鋼連接機，並至宜蘭糖廠購買輕便車軌及地磅等。那時，宜蘭糖廠駐廠稅務員是舊識，在玉里稅捐處上班時，曾被派駐永豐糖廠，時常有聯絡。在他的協助下，各樣機具都買齊，順利運回並安裝，運作順利。油壓式壓榨機，可將原料壓榨得粉碎，產能大大提高。當時，稅率百分之四十，二百多萬的營業額，一年要繳八十七萬多元的稅。十二月的一天，玉里稅捐處來了一位劉姓課員，要查我們糖廠的帳目，查到漏貼一張三元的印花，他就把帳簿全部帶走，要我次日到稅捐處說明。到稅捐處時，劉課員訓斥我們逃漏稅，照規定要罰一千倍，即新台幣三千元。我說：「我們糖廠雖小，一年繳給政府的稅金有八十七萬多元，何謂逃漏稅？」氣憤之下，我當面拍桌子。當時，玉里刑事組就在隔壁，劉課員立即過去，指控我「妨害公務」，要求抓人。我說：「你們動不動就下鄉捉人，糖廠工人一天工資才十五元，三元印花沒貼到就罰三千元，我要申訴。」並隨即向法院提出申訴。結果，法院判決：改罰八百元。我不服判決，決定上訴，但因陳友德在農會理事長任內跑了三年法院，對打官司餘悸猶存，就說「民不同官鬥」，寧可繳八百元結案。

稅捐單位找麻煩，還不只這一件。每年開工前十天，我們要將開工申請書送省政府的財政廳、特產科，以及花蓮縣政府、花蓮縣稅捐稽徵處等各一份。民國四十九年，一切申報手續齊備，稅捐處規定要填的帳簿（俗稱「官簿」）也拿回來了，但那年的開工許可遲遲沒下來。我們決定十二月一日開工，開工當天，稅捐處駐廠人員沒來，不得開工，而甘蔗都已運到、工人也都到齊，原料放太久會變質，等到第三天，陳友德問：「怎麼辦？」我說：「先開工。」到了第七天，七位稅務人員來了，聲稱：「你們是地下工廠，今日來查封你們的糖。」我就出示糖廠登記證、營業登記證、申請許可證、公文、官簿、報表等，說：「這些難道是廢紙，你們如此欺負百姓，我會告到老蔣那邊去。」那些稅務人員看了半天，無話可說，蓋了印章離去。第二

年冬季，劉課員又來查帳，我請他吃午飯，劉課員問：「去年的案子，如何了結？」我說：「原料做完了、稅也繳完了、糖也賣完了，任由你們怎麼辦吧。」

糖廠的監工本來由三弟金信負責，他曾被碾斷一根手指；民國四十六年，在米廠棚上掛皮帶時，手被皮帶夾到，從棚上跌下，斷了一條腿，一時間無法到糖廠監工。那時，我負責米廠公糧業務，只好到糖廠監工、看守發動機，工人不夠時，我加入代班，工人有病痛時，我要緊急將他送到富里醫治。民國五十二年，糖廠改換電力，製糖期間，某日晚飯後換班時，一位老兵因電力沒有聲音不注意，手被甘蔗夾到壓斷，幸好及時切斷電源，立即用卡車將傷者載到富里，並緊急電話通知陳振祥醫師，⁸準備消炎針及止痛劑，轉送往關山陳金山病院醫治。

三、糖廠賣給洪掛

民國五十三年，陳友德出任富里鄉民代表會主席期間，我決定離開富里，結束三十四年的工作崗位，到台東縣瑞源另謀發展。民國五十六年，陳友德將他的「永豐糖廠」以八十九萬元賣給台東洪掛，無毛坪的一甲多地也一併賣掉。洪掛接手後，在距離舊有永豐糖廠一公里的無毛坪興建八十噸級的「東山糖廠」，立起一支高高的大煙囪。由於永豐是一丘陵起伏的山坡地，鹹粘土質，乾旱時，堅硬如石；春季下毛毛雨，泥土不會溼潤；夏季收割、耕作、插秧、除草之際，常有颱風豪雨，水圳、埤頭、牛車路受損，必須修補，完全看天吃飯，唯有新開墾的林野地土質肥沃，收成較好，但地力僅能維持數年。永豐原料甘蔗產量有限，僅能供應四十噸級的壓榨量，東山糖廠八十噸級的壓榨量太大，由於本區域原料甘蔗供應不足，他們便向三公里以外的白糖區獎勵農民種蔗，結果，等到甘蔗壓榨完後結算糖價時，蔗農

8 日治時期東京醫學校畢業，在東京時，和羅阿玉的妹妹戀愛結婚，回東部時，因富里尚無台藉醫生開業，就在街上開業。光復後，曾任花蓮縣議員。

要求以白糖價格結算，引起糾紛。民國七十年代末，因國際糖價不振，該廠就停業了。目前，只剩部分廠房還留在那裡。

梅源米廠

民國三十九年，陳友德在石牌建磚窯生產磚瓦，又在富里永安街興建米廠，面積三分地左右，除三間茅屋外，又用磚瓦增建廚房及住房。施工期間，一天凌晨地震，將屋頂及牆壁震跨，後來才又慢慢修補起來。在永安街建新米廠時，挑水及砂石等，全家大小一起出動。民國四十三年四月的一個晚上，陳友德到永豐糖廠找我，表示：糧食局的公糧徵收倉庫，有意委託我們經辦。我當時表示反對，原因是：自民國三十八年富里開辦公糧徵收業務以來，所有經辦的米廠，全都慘賠。穀販曾福山經辦公糧，短少二千多包稻穀；竹田葉雲仁承辦，虧損二十多萬公斤，被判刑坐牢，出來後改行算命；富里胡預元米廠承辦，虧空三十多萬公斤。我說：「要做，你自己去做，我要和你脫離關係。」但是，陳友德執意甚堅，一連來了三個晚上。第三天晚上，他說：「這件事，我只掛『陳友德』三個字，其他一概不管。由你全權處理。」既然全權託付，我只得接辦。

一、花蓮縣最大糧倉

首先，我拜訪胡預元米廠，該米廠位於鰲溪河邊（在富里村台九線公路橋下），因為虧空嚴重，民國四十三年由我們接手經營，改稱「梅源米廠」。我請教做公糧報表的楊先生，拜託他留職幫忙，同時，也請二位做米工人留下。當時，我看到倉庫前放了一堆發芽的稻穀，就問做米工人阿景：「是何原因發芽？」阿景說：「農民繳交的稻穀，沒有完全曬乾，堆在倉庫會發熱出蒸汽，米質變黃碾不白，而且稻穀受潮後自然會發芽。」稻穀因乾

燥度不夠，堆放在倉庫會發芽導致重量減輕，便是以往公糧業務虧空主因。所以，我們經辦時，收稻穀一定要小心。另外，又請教蕭丁喜經營米廠之道，他說：「農民寄倉的稻穀，如果私自賣掉，等到糧食局來要糧時，你必需買回平倉，遇到穀價上揚，就註定賠錢。如果一切照規定辦事，只有賺不會虧。」一切準備就緒後，我和陳友德到花蓮糧食事務所拜訪課長、所長，對保並簽合約書。由於我們是新手，糧食事務所會盡量幫忙，配送很多舊麻袋來，以便裝穀圍在倉庫四周，避免地震時倉庫牆壁破裂造成危險。我們接下胡預元的米廠時，裡頭有單頭的水力タービン，但動力不足，原有的發動機，則很老舊難發動。民國四十三年，第一期稻作收割時，二十天沒下雨，大粒穀曬到牙齒都咬不斷，公糧交穀很順利。由於我是新手，有鄉親笑說：「幾時學人打算盤，學得會來鬚又白。」

一天，老楊拿糧食局的合約書給我看，載明檢查公糧乾燥度由我把關，倉庫由金信、金煥、老楊及一位老兵負責，周偉雄是糖廠的壓榨工人，需要職務給他，就叫他負責磅穀的工作，兼辦公教米。公糧徵收期間，每天要收二千多麻袋稻穀，過磅時，若有農民懷疑磅秤不準確，隨即換另一支，以示公信。有一天，一位同業跑來罵我：「做米廠全靠那支磅秤，不然，還有什麼好賺。誰像你，專找外人來磅穀？」可見他們開米廠，如何對待農民。那年，總共收到一百三十多萬公斤，是花蓮糧食事務所的第一大倉庫。同時，我們也受委託做外銷米和公教米。由於自家倉庫容納不下，另外租屋寄放，但仍放不下，還有十二萬多公斤放在曬穀場。我對農民說明：「只為糧食局代收公糧，無法兼顧其他業務。」有時，在人情壓力下，給農民方便，幫他們碾米，反倒招來更多麻煩甚至挨揍，我只能出示糧食局的合約書給農民看，表明立場。民國四十三年八月，颱風大雨不斷，各倉庫屋頂都有漏水，我們兄弟買水盆、桶子承接漏水，整晚不得休息，又要防止盜賊偷穀。那年，還要我們先碾外銷米，十分辛苦。花蓮糧食事務所對新手也特別注意，

每二個月派人來清查倉庫一次。

同年，第二期稻作收割時，由於日照不足，永豐、羅山的水田，多半位在海岸山脈西側山腳下，上午十點太陽才能照到，下午二三點又起霧，而且由山泉水灌溉的粘土土質，稻作較慢成熟，剛收割完冬至又到，冬至後十天又是新曆過年。當時，政府規定：各種稅收十二月底前結束，通知農民在限期內必須將公糧運交完畢，由於那時尚無稻穀烘乾機，農民用牛糞舖的曬穀場曬穀，十天八天都曬不乾。農民載穀來交，由我親自檢查乾燥度，我拿一支「放穀槓仔」，每包稻穀都刺取樣品驗其乾燥度，未達標準，一律拒收，請農民載回去再曬。農民老遠用牛車載來的稻穀，又要載回去，眼看繳納期限將到，自然很不高興，因而得罪不少農民。此外，因徵收進度嚴重落後，稅捐單位一再催徵。有一天，大批牛車滿載稻穀等候繳納公糧，各機關催徵人員來了六、七位，到我們事務所問：「稻穀到底要怎樣你們才收？」答：「若照糧食局標準，這些稻穀要拿大鍋起火來炒才能達到標準。」經過解釋，主管機關才准予延期。

二、擴建新廠

民國四十四年夏季，一陣颱風豪雨，不僅沖毀河中糖廠，米廠所收公糧也受波及，部分流失，有的被水浸泡，須緊急處理。糧食局方面，也派人來查報災情，並以電話向花蓮縣糧食物所報告。民國四十五年，我們計畫遷廠，將鰲溪河邊的老米廠全部遷到永安街，石牌的瓦窯移到富里火車站附近，另築新窯，並積極增建倉庫。民國四十六年，又購地增建水泥磚牆及茅草屋頂的倉庫。大量使用水泥要先申請，每次數量至少一火車台，每包四十三元，但市價六十元，有多餘的水泥，可轉售獲利。這年，糖廠換了新的發動機，甘蔗壓榨完畢後，就搬來米廠使用，糧食局也配發水分機來驗穀，徵收效率大為提高。一期稻作公糧收齊，倉庫放不下，寄放民家十多萬公斤，農會也寄放十多萬公斤。

民國四十九年，富里已有電力供應，但米廠設電力後，糧食局加工價格不同，而舊米廠也正準備遷到永安街，暫時仍其舊制。之後，我到高雄購買米廠零件，並連絡技術人員前來設計安裝。不久，米廠屋頂做好，木匠師傅也來設計樓板、辦公設施等，全用上等檜木。碾米機器，由五名師傅前來安裝。民國五十年春，米廠全部移來永安街，老米廠未碾完的稻穀，也都移來這裡碾，辦公室就設在住家樓上。米廠完工，內部共耗費八萬多元。雖然未換電力，十吋的碾米機（コムノール），一百公斤裝的糙米，一小時生產四十多包，一天可生產二百八十包，裝滿四火車台。由於我們的倉庫無法容納，富里七村公糧分三處經辦：羅山、明里、石牌三村，由富里鄉農會負責；學田、三台二村，由莊政覺米廠負責；富里、永豐二村，由我們米廠負責。



富里永安街「梅源米廠」外觀（2008.9.4黃學堂攝）

我經辦公糧前後十年半，雖然不曾出過什麼大問題，但也不免有些麻煩。民國五十二年三月某日，我正在事務所辦事，富里分駐所一位新來的巡官，沒打招呼就直接進入糧食局倉庫，很久才出來。我問：「你是何等人物，進入糧食局倉庫也不招呼一聲，來查什麼案件？身為警察，法律比我懂，私自進入糧食局倉庫犯了國法，該當何罪你知道嗎？別以為我們老百姓不懂法律。」不久，那巡官就調走了。

瑞舞丹大戲院

民國四十六年，東部尚無電視可看，戲院生意不錯，陳友德計劃在富里永安街米廠附近空地興建戲院，我不表贊成。因為，當時西部電視相當普及，我去竹南訂製壓榨機件時，經常去看電影，很好看的影片，卻沒多少觀眾。我提醒陳友德：「以後經營不下去，樓頂觀眾座位的斜坡設施，有什麼用途。難道要留給後代子孫當紀念？」當時，穀價一百台斤二百三十元，陳友德向花蓮地下錢莊貸款新台幣四十萬元，三分利，一年利息十二萬元。戲院上樑時，大樑倒下，差一點壓死人。民國五十二年，「瑞舞丹大戲院」正式開業，不少親友前來祝賀。表面上，人潮多、收入不錯。但是實際上，開銷也很大。請一位放電影師、一位售票員、一位收票員，還有房屋稅、娛樂稅、營業稅、電費、廣告費、片租、寄影片費，以及放映器材等消耗。其中，一部影片稅金一百八十元，片租要四五百元，熱門的片子則要一千多元。有時，一天賺不到五百元，可謂利不及費。民國五十三年，我離開富里之前，把地下錢莊的貸款還清。民國六十年二月，永豐村無毛坪山頂設置了電視轉播站，⁹本地電視日漸普及。同時，西部工商業也日漸發達，導致人口外流，少了年輕人，電影更沒人看。民國八十年，戲院停業。目前，那戲院的方形建築，以及由西部書法家題寫的「瑞舞丹大戲院」幾個字，還留在那裡。



位於富里村永安街的「瑞舞丹大戲院」
(2008.9.4黃學堂攝)

9 張振岳主編《富里鄉誌·大事記》，p.27。

從政之路

陳友德身體修長，一表人材，對鄉親朋友也很照顧，人緣頗佳。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一日，出任富里村長，為民服務。民國三十八年，富里國小駐進國軍部隊，人數約四五百名，永豐國小也有二小隊。某日，一位部隊長官來米廠拜訪，希望借用我們的廚房。陳友德同意了。他們一天只煮二餐，軍人也很守規矩，那位長官表示：「你們有什麼工作需要協助，我們可以幫忙。」於是，就叫他們去幫忙割茅草，但除了捆茅草外，其餘工作沒辦法。這年七月，祖父過世，在永安街廣場公祭，出殯時，駐紮富里國小的司令部有派康樂隊前來協助排場。當時，我們糖廠開工後，也僱用了「干城新村」的一些老兵，工資每日十五元，較一般工人便宜。

民國三十九年，我們在石碑興建一座磚瓦窯，這一年，陳友德出任富里鄉農會理事長，富里鄉有人募款建廟，陳友德便提供所需磚瓦，建到屋頂時，凌晨一場大地震，全部倒塌，以後改用水泥柱頭，終於建好。¹⁰此外，陳友德又在羅山村南邊買了二甲多水田，做為寺廟的基本財產，並擔任寺廟管理委員。廟會演出外台戲時，七早八早把我們兄弟叫起來，開倉庫搬竹子、木板、布篷等把戲台搭好；戲演完後又要拆下，將竹子、木材等搬回倉庫。也因此，陳友德在地方上累積了不少名聲，提起「陳友德」三字，幾乎無人不識。然而，陳友德在出任富里鄉農會理事長期間，職員將花生種籽盜賣一空，帳目不清。身為理事長，陳友德必須負起責任，結果被移送花蓮地方法院，每個月到花蓮地方法院三次，經過三年才擺平。此外，在其理事長任內，我們家所存的十八萬多元糖款，也被職員盜領一空。民國五十三年五月十日，陳友德當選第八屆富里鄉民代表，並被推派為代表會主席。民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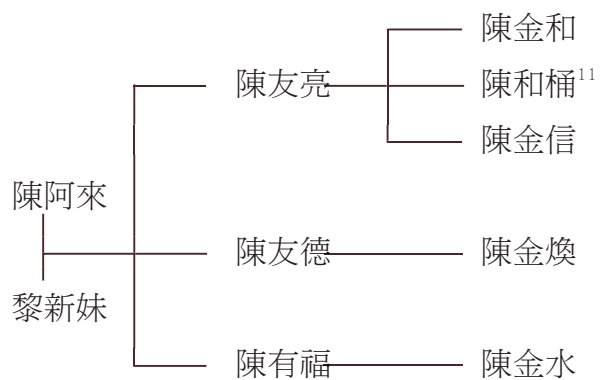
10 其後又經改建，非現在所見者。

五十七年五月底，代表會主席任滿。民國五十九年，陳友德病逝於花蓮鐵道醫院，享年六十八歲。

結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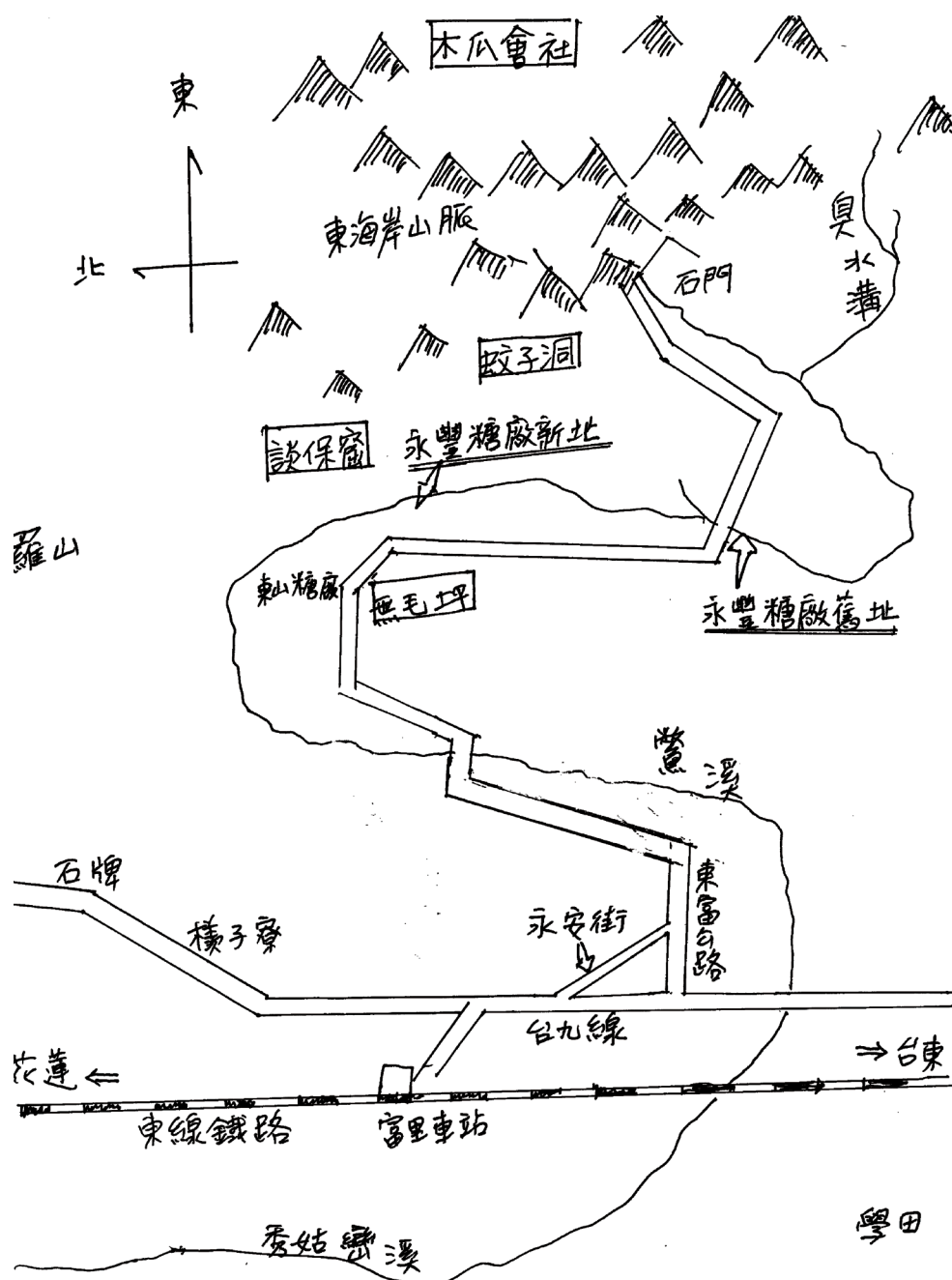
陳家對富里的開發，以及對移墾鄉親的照應安頓，是不可否認的事實，是日治晚期「二次移民」潮中的一個縮影。在這裡，可以看出，陳家是獨立的自由移民，但其發展仍有賴製糖會社提供的機緣，並從事與他在原鄉既有經驗的相關工作。中日戰爭的爆發，更為這股移民潮增添推波助瀾之勢。光復後，在土地改革、通貨膨脹的變動中，陳家卻能順勢崛起。然而，隨著產業變遷、社會轉型、人事更迭以及人格特質等因素，家族事業不免受到波及。陳友德的事蹟，《富里鄉誌》有所記述，但僅寥寥數語，本文僅就陳和桶先生所述，轉述一二，或可為地方史料提供參考之用。

陳友德世系



11 就讀公學校時，曾改名「金統」，有時互用。

花蓮縣富里鄉永豐村示意圖



參考資料

- 1、陳和桶《一生的回憶》，手稿，未出版。
- 2、訪談陳和桶，2008.3.5於瑞源陳宅。
- 3、陳灶榮校訂，2008.6.15於富里陳宅。
- 4、張振岳主編《富里鄉誌》，花蓮縣富里鄉公所，2006.1。